

中國工業經濟
學 報

1

1985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s
Journal

1984年10月创刊

中国工业经济 学 报

(季 刊)

1985

I

3月20日出版

目 录

·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

顾问、理事联席会议

- 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顾问、理事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薄一波 (1)
-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顾问、理事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纪要 (7)

· 工业经济体制 ·

- 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蒋一苇 (9)
- 用活经济杠杆,把指导性计划落到实处 刘 晓 王 建 刘夏平 (19)
- 工业品的价格及其改革 马 宾 (25)
- 论开放与改革 高尚全 (30)
- 论确立国家和企业的正确关系 宋养琰 (39)
- 我国工资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庄启东 (49)
-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刘绍川 杨逢春 (57)
- 关键是造就一支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张载伦 (66)
- 浅议配套改革 顾森贤 汪祖其 (75)

· 工业经济发展战略 ·

-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 吴敬琏 (78)
-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再认识 刘兴华 (90)
- 振兴上海工业的战略与途径 姚钊棠 朱金海 (97)
- 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条件和目标 郭振英 皮黔生 (104)

· 工业技术进步 ·

- 加速技术改造 提高经济效益.....董绍华(110)
真正实现以技术改造为主的重大转变.....田江海(117)
改革经济体制, 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黑爱堂(124)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杨会春(128)
-

· 工业企业管理 ·

- 杭钢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上开拓前进.....郭大震 章 健(134)
斯大林时期苏联推行一长制的做法及其存在的问题.....马泉山(145)
工业企业领导职能和领导行为的研究.....韩岫岚(154)
高级盈利和企业盈利.....杨君昌(163)
-

《新中国工业发展史》选登

-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主要成就与经验.....汪海波(168)
新书评介: 《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评介.....西天钰(181)
-

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顾问、理事 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薄一波

今天到会的同志，很多是多年在一起共过事的老同志。讲理论，讲研究，在座的许多同志比我强。虽然我也从事过一些年的经济工作，但是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天在许多有理论、有经验的同志面前来讲话，可以说是“班门弄斧”，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现在，全国的学会、协会很多。有不少是办得好的，也有不少起的作用不大，还有一些不起作用，甚至起了不好的作用，只是为了赶时髦，安插人，拉关系出国，等等，所以需要切实加以整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成立的时候，就要我来当名誉会长，我犹豫了一下，当时没有答应，当然也没有拒绝。后来，我作了点调查研究，知道这个学会办得还可以。半年过去，主持学会的同志还是坚持要我挂个名，却之不恭，只好应命；不过，我还是想，这个名誉会长由我来当，实在有点受之有愧。

方才听了蒋一苇同志的工作汇报，得知学会成立时间虽然不长，已经作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看来还是需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这么个组织。它的会员都是经过挑选的，许多顾问和理事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推选和聘请的。学会的方针，第一是务实，第二是精干，我赞成。其他的学会和协会我想也应该这样。所谓务实，当然不是简单地实地去干就行了；如果那样还要我们的理论家做什么！还是要给理论家以应有的使命。我的看法，务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精干，指的是组织，不是虚张声势，重要的是把工业经济界的人才都邀集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共有十条，邓小平同志说，最重要的是第九条，他归纳为八个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办学会也应该这样。要发现有真才实学、有实践经验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请他们参加学会，通过经常深入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对改进工业经济工作，提出扎扎实实的建议。这里重复说一下，对学会、协会，要区别情况，要整顿一下，特别是全国性的这种组织不能想成立就成立。最近中央发了通知，明确规定这种组织要经过批准才能成立，已经委托体制改革委员会管一下这件事，这很有必要。附带说一句，现在到处成立公司，也是良莠不齐，有不少公司就是为了借机发“改革财”，而不是为了真正搞活经济。这种公司，实际上败坏改革的声誉。第二期整党将要狠狠地抓一下这件事。

刚才学会的工作汇报里讲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公开的学报，发表论文；一个是内部建

议,向中央和有关的部门提供意见和建议。还提出要办工业管理高级研修中心。这都是必要的。办高级研修中心这件事,很重要,但一定要办好,不能徒具虚名;真正办好,从这里可以培养出一些经济管理的领导干部,当然也不是主要依靠这个培训中心来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就要有足够数量的能够胜任的干部,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来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对干部的四化要求应当全面理解和掌握。知识化、专业化,当然很重要,但这也不是说,只要大学毕业,学了某一个专业就似乎干什么都能行了。其实不然。现在有个问题,把一些搞工程技术的专业人员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其中有胜任的,也确有不胜任的。这些人原来在工厂担任工程师,工作得很好,一提上来确实拿不起来,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体上还需要一些“万金油”干部当领导。当然,讲“万金油”干部不那么好听,这里是借用,不含贬义。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只专某一行,而是需要更宽的知识面。要懂点技术,还要懂点经济,懂得经营管理,还应当懂点哲学。当然,首要的是要有理想,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所以,对干部的四化标准要辩证地理解,正确的东西也不能搞绝对化。话说得远了些。这里主要是讲办研修中心很有必要。

我很赞成办经济管理院校,包括学会要举办的高级研修中心。因为即使你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如果不会用,不会管理,还是不行。不少企业技术装备好,电子技术呀,自动控制呀,但管理跟不上,不会管理,先进技术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要使技术和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培训的问题就更为重要。同时,企业的领导干部工作了些年也应当深造深造。技术知识有个老化的问题,管理知识是不是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在美国波士顿看了他们的斯隆管理学院,类似我们讲的研修中心。那个管理学院,是给资本家培养经理人才的。一个经理或者别的什么人工作了一些年后,就送到那里去深造培养。据说美国不少大企业的经理就是斯隆管理学院培养出来的。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的办法,采取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培养自己的经理和厂长。

我们的学会要研究当前的的问题,这就要借助历史的经验。在座诸位都是长期在经济战线上工作的,三十多年来我们是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这一点不要小看。不是说今天要改革了,好象过去就没有多少成绩。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的工作,他是我们财经界的头头,我协助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得益非浅。一九五三年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小平同志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时,主持全面工作,也包括经济工作,他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我们的建设做出了明显的成绩,这一点不要小看。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建设取得了不少的经验,这一点也不要小看。当然,我们的经验里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不是都正确。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正确,到三年“大跃进”的时候就乱套了,勉强维持了几年。六十年代的前几年进行的调整,那个时候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负责,尽管调整中间也不那么顺当,但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党和国家度过了危难。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们二位也一起下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竟然持续了将近十年!打倒了“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调整经济的繁重工作,我们的国家才又重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这六年多来,我们的经济逐步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在农村取得了显著成绩,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做了不少研究和初

步实践，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基本总结。我们的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的成功，取得了重要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提出在今年开始进行全面改革，把城市改革的步子迈得大些。我们的学会就要研究研究我们走过来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地更好地前进，为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来的。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说起来也是老话。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么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是依靠这个结合才取得了胜利。解放初期，我们是按照这个思想，去探索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应当说也摸到了点门路，可是后来背离了这个思想就乱了套。所以，看似寻常的一句话，要真正理解它并不容易；照着去做，坚持下去，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先是大革命，然后是十年内战，不断地总结经验，对于中国的革命才获得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比较完整的理性认识。建国以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成功的方面；有些失误也难免，但是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经历的曲折过多了。从“大跃进”开始，以后出现多次失误，由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所以发生了那些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如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的，这是一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活的政治经济学。在座诸位首先要很好学习、领会、贯彻这个重要决定，同时有责任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对这个决定进一步加以科学的阐述。单靠中央说过的话是不够的。现在有不少年轻的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写文章宣传这个决定。有些文章写得很好。希望经济理论界的老同志们也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摘引了黑格尔这样一段话：“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列宁称赞这句话富有深刻的哲理，说它是唯物主义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应当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宣传，使中央的决定取得预期的成功。

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利于在这个基础上对工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这一条很重要，做起来又很不容易。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写了一部《资本论》，用了四十年时间，他在世的时候还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恩格斯帮助整理出版的，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是考茨基整理出版的。这说明研究经济运动的规律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才要下功夫，学会运用经济发展的规律，把我们今天四化建设的文章做得更好。

从历史上说，我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算快。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一再出现比例失调，不得不进行调整。过去有许多问题搞得不那么合适。譬如计划到底怎样搞法？现在看来必须有指令性计划，还一定要有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等等。过去曾经提过“重轻农”的次序，后来改为“农轻

重”。不管是“重轻农”，还是“农轻农”，总是没有搞得那么妥当、合理。现在能源、交通的问题就很大。经济结构到底怎样才合理，这个问题长期也没有解决。我们的经济有明显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总的来说，并不是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特别是技术比较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改善得慢，长期处在比较贫困的状态。在建设时期，经济问题长期解决得不好，尤其是搞“穷过渡”之类，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让农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让广大人民群众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那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党，现在的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正确指导今天的建设，这几年取得的显著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汇集了小平同志近几年的重要谈话、著作，这些重要著作，也可以说是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结晶；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有了一个关于改革的重要决定；近几年中央还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无疑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都是把握正确方向的。当然也不能说有了这些就万事大吉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是这样。还要看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引导，要看亿万群众持久的努力。拿改革来说，既要不失时机，又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总而言之，大的方向定了，没有错。在具体做法、步骤上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不对就改。当然不是改变总的方向。总的方向是不能改的，因为它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符合亿万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如此等等，这些统统不能改。但对具体的规定、具体的做法还要注意研究，不适当的要随时调整。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原则定了，但具体做起来，究竟怎样办？还有提倡竞争，不仅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当然意义不同），等等，这些都应当边实践、边总结，很好地加以研究，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拿对外开放说，近两三百年来，闭关自守，我们吃了大亏，经济长期落后。当然，造成我们长期贫困落后，有帝国主义列强长期侵略的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的要反对“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又总是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彻底呢？恐怕是同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确原则的片面理解有很大关系。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东西不必都要自己制造，可以进口，这对我们无害而且有益。当然，进口也要经过综合平衡。总之要把长期禁锢我们思想的东西打破，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国家不搞“大而全”，企业的“小而全”问题才好解决。

我们的中央对待每一件重大事情，从原则、从方向上提得明确、肯定，抓得很紧，但在具体工作上，又十分强调要谨慎从事，要讲究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一切工作要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路线，不断总结经验，集中起来提到理论的高度，再坚持实行下去。工业经济学会的同志们都有责任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老经济学家和经济界著名人士一定要注意同中青年的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结合起来。学会要吸收相当数量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吸收办工业、办企业卓有成效的中青年同志。这样，这个学会才有活力，才有旺盛的生命力。老同志不是不行，但毕竟老了，在经济界也有个老年同志同年轻同志合作和交替的过程。

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国外一些大学不主张把本校的毕业生留在自己学校里做教师，要

吸收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来讲课，搞交流。近缘亲，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学会，也要注意不要都是同年代的人和同一个学派的人。要老中青结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并提倡不同经历、不同观点的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共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会要新老结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结合。在座的老同志有经验，是先生；而事物的发展规律，学生总是要胜过先生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老同志要不落后，就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有许多新的东西，一般说来老年人不容易很快接受，譬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呀，提倡竞争呀，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呀，等等；而青年人就接受得快。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弄清楚，老同志需要同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同志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要重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人才。现在不是讲自学成才吗？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是自学成才。在二十年代的旧中国，没有条件在学校里读马列主义的书，但那时候出版有《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蒲洽德编的《通俗资本论》，还有我们党的刊物《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等等。我们许多同志的理论启蒙就是靠自己学这些书。今天，自学也好，学校深造也好，都要联系现实。比如我们年轻时读过的《共产主义ABC》，是讲基本理论的，从商品讲起。什么叫商品？第一句话就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就叫商品。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要结合新的情况进行学习研究。还有提倡竞争，过去我们总是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现在也提倡竞争，这同资本主义的竞争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一国两制”，应当怎样理解？这些新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看一看，想一想，给以科学的说明。马洪同志在最近的这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不错嘛！

我们面临一个新技术的挑战。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打不起来，即使有资格打这种仗的超级大国打起来，我们也不会参加。但技术战、知识战，这两个大战是本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半个世纪都将是激烈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否则，我们的四化建设就不会计日程功。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技术进步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是大家一起上，都搞新技术、新兴产业，还是有重点地搞？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结合？是否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采用最新技术，还是以发展中间技术、适用技术为主？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如何结合、并举？研究和处理这些问题，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说，建设新企业与改造老企业的关系，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关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军工与民用的关系，等等，如何正确处理，也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等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要解决两个关系问题，就是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正确关系，以及由此而牵动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包括：改革计划管理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建立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等等。当然，这些方针、原则

的实施，在具体的做法上，也还有许多问题要从理论上实践上进一步探讨，比如说，紫阳同志提出过的权力下放给企业后谁代表国家的问题等等，总之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必须跟上去。

国内国外都有些怀疑我们的改革，会不会背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加以阐明。我们打破老框框、老模式，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管理方法等，是根据中国实践的要求这样做的，这不是搞资本主义。我们主张多引进些外资，多引进些技术，希望沿海两亿人口地区先富起来，再支援和带动内地也富起来，即使沿海开放城市多引进了些外资，包括让他们独资经营，在全国来说也只是一点点，它有利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绝不会成了资本主义。我们是用这个政策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一国两制，只限港台。从我们的改革来说，并没有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觉调整，使它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只要认真研究《决定》的全部内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拿所有制结构来说，我们改变了过去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的“左”的做法，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但是公有制仍然是我们社会经济的基础，全民所有制经济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

要学习中央的文件，学习中央同志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年前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大家普遍认为很重要。这篇讲话编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摘要公开发表后，最近看到美国专栏作家奈恩评价说，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讲话，在下一个世纪，人们可能会普遍同意，本世纪发表最重要讲话的人不是里根，而是一位中国人。这个评价比我们高，我们应该从这里悟出点道理。我们自己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解得怎样？这不是说不要很好学习经典著作，经典著作一定要学，要打好理论基础，同时也一定要很好学习现在的一些重要政策性文件。最近我特别注意到，陈云同志选集中有许多经验被赵紫阳等同志吸收过来了。所以，我们总书记的、总理的讲话，工业经济学会的同志都要好好学习和研究。比如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赵紫阳同志最近就有重要论述。他最近说，消费结构现在有很大变化，过去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九六一年实在困难，陈云同志提出议价卖炒肉片、尼龙袜子，群众很高兴。现在不同了，消费结构不是这些问题了。城乡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万元户”越来越多，购买力那样高，消费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讲“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现在这些不算什么，他们要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还有摩托车。在广大农村，纷纷建新房，有些专业户还要买大汽车、小汽车。所以现在彩电、汽车、钢材紧张得很，有人就钻空子倒卖，不用提货，一张订单卖出去，就够一辈子吃用，这大多是那些皮包公司干的。去年，我们的粮食已经提前达到八千亿斤，棉花达到一亿一千万担。很长时期工业总产值都是上海在各省、市、自治区里占第一位，辽宁占第二位。现在是江苏占第一位，上海占第二位。农村经济发展了，乡镇工业发展了，江苏乡镇工业力量很大。农村富庶起来了，消费结构起了变化，同是吃穿用，要求也提高了，高级化了。适应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变化，工业结构、生产结构就面临着一个调整、改革的问题，要按新的情况处理好。计划体制也必须相应地改革，指令性计划要适当缩小，指导性计划要增加。当然，这两句话真正做起来，而且做得适度，很不容易！面对类似的许多现实问题，我们学会的同志就要

(下转8页)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顾问、理事联席会议

第二次会议纪要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顾问、理事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于1985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学会顾问、理事共48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部分编研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秘书长关于学会成立半年多来的工作情况汇报，确定在新的一年里围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展学会活动的问题。名誉会长薄一波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吕东会长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一致通过增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经济组常务副组长陈元为副理事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申祥、国家经委体改局局长徐震为常务理事，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才晓予、兵器工业部副部长李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组书记陆斐文、北京市机械工业公司副经理陆首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伟立为理事。会上，吕东会长向学会顾问段君毅、马洪、周太和、许涤新、华罗庚等38位同志呈送了聘书。

与会顾问和理事满意地听取了秘书长蒋一苇同志的工作汇报。他概述了1984年4月学会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

(一) 学会的组织建设已初具规模。截止1984年底，经会员介绍、常务理事会通过接受的会员共232名，分布在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经济研究部门、高等院校和大型骨干企业。为指导学会研究活动，遴选聘请了38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专家和自然科学家担任顾问。

(二) 由会员自愿结合组成的八个学组，都开展了同当前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密切结合的课题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提供一批研究成果。去年八月以企业管理学组倡议举行的大型骨干企业座谈会，就“小企业搞活了，大企业怎么办”的问题展开讨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专题报告，所提建议正由政府主管部门作进一步研究。

(三) 学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合作筹办的大型学术性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已于年前出版创刊号。为四化和改革献计献策的内部刊物《内部建议》已出版10期，其中有些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或被采纳。

(四) 筹建工业管理高级研修中心的工作，正加紧进行。这一工作，获得了国家经委、计委、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批大型企业的赞助和支持。

蒋一苇的汇报也指出了学会工作存在的缺点和困难，将在今后努力解决。

学会筹备时期，即提出请薄一波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与会顾问和理事对他接受这一邀请，并到会讲话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薄一波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学会的重要作用和成立以来的成绩，对学会章程规定的“务实、精干”的办会宗旨十分赞成。他说，务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精干则是讲组织、讲人才，不要滥竽充数。他提出，学会要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中心，当前，要特别注意研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走一步，总结一步，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对中央提出的重大问题给以科学的说明，把改革的工作做得更好。在新的一年里，为了使学会办得越来越好，他一方面寄望于老同志；同时，要求发现和吸收优秀的青年经济工作者和青年经济学家到学会里来。他援引黑格尔的一句话说：“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的完全正确）的口中说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期望在座的工业界的老同志、老朋友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同年轻的同志一起，共同研究问题，取长补短。他说，毕竟应该承认我们老了，需要有年轻人上来，互相结合，新老交替。青年人总是要超过老年人。我们要不落后，更要和青年人在一起。他希望学会今后越办越好，作出更大的成绩。

吕东同志最后讲话说，现在我国的企业正处在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学会进行研究。各学组的研究计划应当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作必要的补充、修改，对于吸收青年会员的问题要按照薄老的指示予以重视，使学会更活跃、更有生气。

（上接第6页）

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而且要出成果，出人才。

最后再重复一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成立有必要，理应做出很好的成绩，也一定会做出很好的成绩。我相信工业经济学会能够办好，预祝它越办越好。

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蒋 一 苇

作者 蒋一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内容提要: 作者在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说明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区别,进而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五年来城乡改革的基本经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特别指出了“国有”与“国营”的区别,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两级按劳分配,解决两个“吃大锅饭”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把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经过五年的实践,我国经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的改革虽然还不配套,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对这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伟大的历史变革,应当如何理解、如何认识,国内外都有很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学者和新闻记者,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一方面赞扬我们的改革,一方面总认为我们的改革是“自由化”,是向着资本主义靠拢。国内有些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的好同志,也忧心忡忡,为改革的方向而担忧。究竟我们的改革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倒退,还是进步呢?这是当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必将从旧的生产方式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决不是一种宗教的信念,而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又提出了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要经过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些建立在深厚的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基本理论和科学预见,迄今还没有任何历史事实可以动摇。

但是,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一百年前对历史进程的每一细节作出具体的勾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的历史阶

* 这是作者1984年8月所作的报告。

段,究竟要经历一段多么长的历史时期?要采取哪些过渡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下,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些都只能在实践中予以回答。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作为开路先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是不足为奇的。继十月革命之后,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很自然地都以苏联为榜样,采取了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但是经过一段社会实践,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一,也由于苏联模式本身的缺陷,从五十年代开始,东欧一些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客观发展的历史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生产的主人,从而调动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从而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这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我国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虽然经过多次的折腾,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农业平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3.3%,这样的经济成长速度乃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左”的错误,使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加宏伟的成就而未能取得。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同一的概念。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包含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等基本特征。经济体制则是实现这些基本制度的具体政策和组织措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探寻一条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更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展道路和有效的管理体系。外国某些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往往把我们所说的“体制”和“制度”混为一谈,是一种只看现象,不察实质的误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在理论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涌现了大量的新生事物。在大胆探索的道路上,每一项革新行动,每一项具体的政策措施,不能说都是完全成功、完全合理的,整个改革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从五年来改革实践的基本经验看,所走的道路,完全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朝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

五年来城乡改革的基本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

实行公有制,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过三大改造，在全国建立了雄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种“左”的片面思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认为经济组织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企图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实行“穷过渡”，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急急忙忙取消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以至禁止个体经济的存在；在公有制内部，也限制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已有的集体经济则实行“集体按全民办”，对农村集体经济则扩大规模，实行“公社化”。这些凭主观意愿的激进措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必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时间的过渡必然表现为空间的并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所有制结构必然是多种形式在空间内并存，而且经济生活的复杂性，还要求同一种所有制采取多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才能把整个经济搞活，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共产主义决不可能凭主观愿望，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来实现，它只能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可能逐步实现。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我们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采取的每一项有效措施，都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背离客观发展规律的每一项“形左实右”的措施，都只能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几年来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就是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教条束缚。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了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农村则缩小了集体经营的规模，逐步建立起以承包责任制为特征，以农户为本位的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使所有制结构更加多样化；全民所有制经济也朝着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盈亏责任制或自负盈亏。过去我们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叫做“国营”企业，似乎“国有”就必须“国营”，因此由国家直接承担企业的经营管理，使企业成为缺乏自主活力的附属物。现在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实质上，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全民企业除了少数必须全国统一经营，实行“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外，大多数企业可以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一些小型企业还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经营。这一系列的改革，适应了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它丝毫没有动摇公有制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巩固和壮大了公有制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但实行对内搞活经济，而且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状态。

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是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我们在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利用国际资本所积累的资金与技术，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和国际资本打交道，当然只能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行事，在经济合作中允许国际资本获得必要的利润。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对我们是有利的。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除了加强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几年来我们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形式,开始引进外资,引进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在所有制结构上,实际上重新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以引进外资为目标的经济特区,还形成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地区。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设置,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重大改革。将来香港收回,台湾统一后,在我们国土内不但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地区(经济特区)存在,还允许少数资本主义地区的长期存在。

对于这些重大的改革与发展应当如何理解呢?是否意味着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呢?不会。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公有制的成分仍然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没有改变。少量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开展对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加快四化建设的进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从理论上讲,它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是这种过渡的客观要求。

二、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国家 计划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的商品经济

实行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我国从1953年开始了有计划地经济建设,使我国在不长的时期内,逐步建成一个部门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但是在计划管理体制上,沿袭了苏联的一套高度集中,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办法。在观念上,把计划经济和计划管理等同起来,又把计划管理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似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就必须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用指令性的指标统起来;指令性的指标越多,对经济活动管得越细、越死,似乎计划经济的水平就越高。这种出于主观意愿的设想,事实上从来都做不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土上,企图把千头万绪的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都由中央集中的计划统起来,只能是一种空想。多年来实践的结果,除了把工农业生产统死之外,不但没有实现按比例发展经济,而且一再出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消灭商品。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商品生产非常不发达的国家,不但必须存在,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运用市场机制和发挥价值规律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

几年来,在理论上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改革的实践上,则沿着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方向不断前进。农村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专业户、重点户,商品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城市工商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通过改革流通体制,开展市场调节,也大大促进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逐步改变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调节经济的办法，开始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实际上也就是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所谓对内搞活经济，实质上是在国内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所谓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在国际上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归根到底可以说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有些同志受旧的观点和多年习惯势力的束缚，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看成是矛盾对立的两个范畴。实质上，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是自由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是就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组织与控制而言；我们说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则是就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用计划指导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商品之间并不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对立。

有的同志还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对发展商品经济产生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顾虑。实际上，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形态，它在原始共产主义后期就产生了，不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商品经济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两者之间有其共性的一面，但更有本质的区别。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人，实行按劳分配，劳动力就不是商品。

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既然不是对立的两个范畴，计划与市场同样也不是对立的两个范畴。如果我们不把计划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是要用计划来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计划可以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部分。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内容进行直接的控制，在此之外，应当都包含在指导性计划范围之内，并运用经济杠杆进行间接的控制。

就市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既然仍然存在商品经济，所有的商品必然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流通，这就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国家对某些关键性的商品进行一部分的直接控制，是国家对部分市场的直接控制，形成“国家市场”；国家不直接控制的部分，允许自由流通，则形成“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是包含着这两种市场在内的统一市场，不能把国家市场看成是商品经济之外的产品交换。

五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实践，使我们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概念，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可以走出一条适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真正达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三、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两级

按劳分配，解决两个“吃大锅饭”的问题

实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在全民和集体经济中，对劳动者的消费品分配，原则上是实行按劳分配。但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着实际上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形成所谓“吃大锅饭”的现象。农村中依靠行政命

令的集体劳动和评工记分制，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与企业之间经营好坏一个样，与职工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职工的工资不但由国家规定统一的标准，而且定级、升级也要在国家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按国家规定的办法统一调整。职工劳动成果大小对劳动收入不发生直接的影响，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现象，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城市集体企业由于广泛实行“集体企业按全民办”的办法，也同样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理论上彻底批判了各种否定和歪曲按劳分配的谬论。在农村改革中，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正确地解决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使农民的收益和自己的劳动经营成果直接挂勾，从根本上打破了平均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城市改革中，由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盈亏责任制，企业有了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独立经济利益，开始打破企业与企业之间完全吃大锅饭的状况；企业内部实行奖励制度，推行经济责任制，也开始打破职工与职工之间吃大锅饭的状况。但是，这仅仅是个开端。在城市工商业的体制改革中，如何更合理地解决国家、企业与职工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当前正在进行的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途径。

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不完全是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还存在着积累的再分配问题。但是仅就消费资料的分配而言，也还存在着国家（或社会）对企业、企业对职工这两个层次的分配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级分配无疑都应当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要实行“两级按劳分配”，以解决两个吃大锅饭问题。

关于“两级按劳分配”，这几年在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但是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必须实行“两级按劳分配”，才能使职工个人利益不仅和个人劳动贡献挂勾，而且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挂勾，更有效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按劳分配原则，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取消商品，职工的劳动可以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此社会可以直接对职工个人进行按劳分配。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社会只能承认商品的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劳动者的个人劳动不能直接成为被承认的社会劳动。因此社会也不可能对劳动者个人进行按劳分配。职工的个人劳动只能凝聚在商品中，作为企业集体劳动的成果向社会提供，社会也只能承认企业所提供的有效商品中所凝聚的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量。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必然要采取社会对企业，然后企业对职工个人的两级按劳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必然的发展。

我们过去讲按劳分配，不讲对企业的按劳分配，只讲对职工个人的按劳分配，是和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过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被认为是必须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经济单位，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也被认为是国家的职工，因此